

跨文化交际视角下文化教学元素分析——以“蝙蝠”意象为例

王梦瑶

贵州民族大学，贵州贵阳，550025；

摘要：蝙蝠意象在中西方跨文化交际中差异较大，其所承载的文化寓意也大不相同。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中西方在宗教、建筑、纹饰、影视学形象等层面对蝙蝠意象的认知差异，总结出跨文化交际新模式：即尊重差异、双向交流、构建命运共同体。在实现交际效果最大化的同时探索国际中文教育之文化教学新视角。

关键词：蝙蝠意象；跨文化交际；文化教学；新视角

DOI：10.64216/3080-1486.25.05.041

引言

“蝙蝠”最近一次在大众视野中“博得”广泛关注还是几年前。当时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，国内一致把疫情的矛头指向该病毒的自然宿主，并赋予其“丑陋且有毒”的负面标签。但实际上，“蝙蝠”所承担的中国传统文化寓意与此恰恰相反，深剖其内涵对于文化教学以及思维模式来说具有可行意义。

1 跨文化交际中蝙蝠意象的中西差异

蝙蝠意向在中西方跨文化交际中差异较大，下文将通过对比其在宗教、建筑、纹饰、影视学形象等层面的意象不同，分析中西方文化差异原因，总结跨文化交际新模式。

1.1 蝙蝠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中国寓意

蝙蝠最初只是表示一类动物，但后来随着中华民族图腾和符码意识的觉醒，被逐渐纳入到画符行列，且在历史推进和生命延续中被赋予了越来越丰富的含义。在宗教文化中，蝙蝠是神圣的代表；在建筑纹饰中，是祥瑞的代名词。

据《苯教〈蝙蝠经〉研究》分析，“蝙蝠在我国藏族苯教中扮演着神人之间的信使和世间证人的身份，其地位是比较高的。它在民间苯教的经文中是一种特殊的鸟，是唯一一个可以飞行的哺乳动物，它承载着人和神的媒介作用，民间有祭祀蝙蝠的习俗。”^[1]《蝙蝠经》原文以带有神话寓言色彩的对话形式成文，并赋予蝙蝠以积极寓意加以敬畏、祭拜。可见，在藏族苯教中，蝙蝠形象的地位很高。与藏族苯教相类似的还有纳西族东巴教，虽地域不同、文化背景不同，但相类似的蝙蝠形象解读却是很值得注意和思考的。

纵观两者的解读，其之所以会对蝙蝠产生敬拜的信仰，除了受动物崇拜的传统影响外，体现更多的是古人对不可全知物种的敬畏感，敬畏所以延伸出敬拜。英国学者胡司德曾指出，“动物之于人，不仅仅是单纯的材料，或抽象化为图形符号，而是人类思维在动物身上的演绎和解读。”^[2]

蝙蝠作为一种纹饰，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中，当时蝙蝠造型保存着其原始特征。春秋战国时期记载道：蝙蝠图符多用于青铜器、漆器等物的局部装饰，造型比较自由、形式单一，所传达出的是我国古人最朴素的自然观。^[3]之后在东晋葛洪的《抱朴子》一书中提到过蝙蝠：“穴中蝙蝠大者如鸟，多倒悬，得而服之，使之神仙”。^[4]宋朝时，在皇宫与民间的推动下，蝙蝠造型逐渐得到大众普遍认可。后在明清两代进入全盛期，得到民间人们的广泛追捧。

北京和珅恭王府以蝙蝠纹饰所闻名，并以“福”为主题所打造的“万福之地”。因王府不能等同于皇家礼制，但又要凸显其不同寻常的富贵感，便很巧妙的选取了“蝙蝠”意象。结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语言文字系统分析，蝙蝠与“遍福”谐音，“蝠”又与“福”、“富”谐音，象征着福气、富贵，被认为是祈福纳吉的祥瑞之物，符合文字讨彩头的文化心理。在蝙蝠的装饰纹样中不仅在文字上讨彩头，而且同时将蝙蝠图像化为蝙蝠纹。赵梦瑶、周小儒在《恭王府的福文化》一文中分析，“蝙蝠纹从蝙蝠这种动物由自然抽象化为生活中的艺术符号，符合人们的心理情感，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，充满着生活乐趣和信念，蕴含着劳动人民积极乐观的心态。”^[5]蝙蝠纹不仅表达了直观化情感，更深层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特有的心理素质和审

美追求。

我国南岭地区祠堂装饰的“福文化”在传统意义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。广州陈家祠建筑上的“蝙蝠”，是南岭地区劳动人民文化长期积淀的表征，也是陈氏族人追求吉祥幸福、家族平安的精神寄托。^[6]另外，经过对比分析发现，蝙蝠纹在民间装饰中有很强大的适应性，可与多种物象结合在一起，并产生多种吉祥寓意。如：人物、祥云、铜钱、莲花等意象。

蝙蝠纹饰最凸显的应用是在民间建筑装饰上。目的是震慑、保佑、祈福，其前后贯通的是劳动人民的浪漫想象和真挚祈求。但除了在建筑纹饰方面蝙蝠纹有广泛的应用外，在传统戏剧脸谱、水利工程等方面应用也很广，都沿用了积极正面的蝙蝠意向。

1.2 蝙蝠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西方内涵

与中国不同，西方对蝙蝠的原始认知以负面为主。对于西方观念认知的理解有两个通俗易懂且又接近生活的切入点。一是，西方在语言表达中古今的变化，二是，影视艺术中的蝙蝠意向。

在《圣经》中，蝙蝠是吸血鬼的化身。据记载，原生活于伊甸园的莉莉斯，因心生不满离开伊甸园后生活在红海附近，后与当地恶魔生育了吸血鬼。且西方人普遍信奉基督教，与吸血鬼相关的传说也源于此。^[7]在基督教中，认为血是罪恶之物，蝙蝠与吸血鬼都以血为食，因而都被认为是恶魔。

在古希腊文化《伊索寓言》中，其所塑造的蝙蝠形象是在鸟类和兽类间随意切换的“墙头草”形象。^[8]这种形象解读，与我国藏族民间成语“鸡税鼠牙”的寓意异曲同工：都代表着一种寻找借口、推卸责任、偷奸耍滑、左右逢源的负面形象。以上可见，中西方民间在蝙蝠的释义上产生了交集。据摩西五经之一《利未记》记载，蝙蝠被归入“可憎，不可吃”的范围，且是邪恶的象征、魔鬼的代表。它具有狰狞的面目、夜间活动的习性以及阴暗潮湿的生活环境，且形象与恶龙、恶魔撒旦同构，还经常与女巫联系在一起，是一种邪恶的意象。这种邪恶的意义指向实际上是跨文化交际的产物。

大家现在所熟悉的长着尖牙、身着黑袍的吸血鬼，是18世纪的创作者结合美洲吸血蝙蝠特点而塑造的形象。大多数蝙蝠以植物的果实、昆虫等为食，只有中、南美洲的三种蝙蝠才吸食动物的血液。这证明了蝙蝠意向内涵的不断丰富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产生的。^[9]

美国DC漫画公司所塑造的蝙蝠侠形象，扭转了西方单一的心理认知。郝健提到，“蝙蝠侠的出现具有强烈的美国本土文化色彩，他是秩序的最后捍卫者，且完

成了全部自我身份认同和人格超越，并最终实现美国文化认同。”^[10]在影视文学解读中，该影片主题为“以暴制暴”，但归根到底离不开对蝙蝠最初意义原型的解读。社会需要英雄解决无法用法律来制裁的犯罪行为，这也是选择本身就代表邪恶之意的蝙蝠形象的原因之一。

恶魔蝙蝠形象还与西方骑士精神和基督教救赎精神有很大关系。通过影片可分析，蝙蝠侠形象的塑造，离不开圣经熏陶下西方文化心理的影响，同时还带有古希腊悲剧性色彩和人文关怀。^[11]

2 跨文化交际中蝙蝠意象分析与教学

相同的意象，在中西方解读中差别却很大，这所体现出来的是在跨文化交际背景下两者的思维观念差异。所以更应求同存异，共同构建重合认知体系，实现跨文化交际效果最大化，并将这种跨文化交际模式应用到文化教学中去。

2.1 跨文化交际中蝙蝠意象差异分析

产生差异的原因多样，大体可从地域背景差异、思维模式差异、现世理解三个层面分析，下面分而述之。

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生活于不同地域背景下的人，其生活习惯、性格特点、思维模式也大相径庭。中国人的“大陆文明”使得中国人在生活中更注重现世，思维模式也较为封闭。^[12]因此在对蝙蝠意向解读时，祈求现世幸福更贴合中国大众的认知，这也是一种感性的意向理解方式；而西方的“海洋文明”相较之下，则更注重精神信仰，思维模式也较为开放。地域背景差异导致中西方在跨文化交际中，很容易产生认知偏差。且在交际过程中，双方都会持有民族中心主义观念和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，从而造成交际障碍。

中国及东方国家注重“天人合一”、注重思维模式直觉整体性，只求神似，更讨彩头，主要以感性为主；而美国等西方国家，秉持的是理性原则，注重思维模式的合理化、理性化。所以，中国人对蝙蝠“遍福”的释读更偏感性，而西方则更注重将感官认知与思维结合，强调逻辑、合理，从而把蝙蝠丑陋的形象与邪恶的特性联系在一起。

相较西方，中国倾向于人，且更注重现世人伦生活，所以把蝙蝠加工成吉祥符码，目的就是为了求福、求富。而西方则更注重神，更注重精神层面，其文化心理更注重宗教文化性质。

2.2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文化教学模式

在跨文化交际中理解偏差的出现很正常，但应看到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，并着力解决、尽力规避。互相尊

重差异、双向交流、构建命运共同体是实现有效跨文化交际的正确选择。

“跨文化有三种语境。一是‘cross-cultural’，强调的是文化的交互性对话与合作；二是‘inter-cultural’，强调的是平等地认识他者、审视自我；三是‘trans-cultural’，强调的是超越分裂的文化碎片、创造有生命力的公共文化。”^[13]

无论是在哪种语境下，跨文化交际都不是单方向的。所以，从这个最基础的概念便可理解跨文化交际的双向性：“双向交流是一个动态概念，且不仅发生在交际的过程中，也存在于交际之前及之后。”^[14]所以，针对于蝙蝠意象的理解，应尽可能广泛地去拓宽眼界，了解对方文化。这也是顺利进行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前提和保障。最后，应在跨文化交际基础上共同探讨蝙蝠意义的解读差异，并在双向交流中寻找认知的最大公约数。

所谓刻板印象即对一个群体成员特征的概括性看法。消除刻板印象，不应只宽泛于中西方跨文化交际的过程，更应具体到中西方对“蝙蝠”认知的刻板印象中。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蝙蝠意向虽也存在负面认知，但大部分还是以积极正面形象所出现的。而西方则应克服传统宗教解读中对蝙蝠负面评价的影响，尽可能接受其积极正面意义，全面认识蝙蝠意向。

“文化认同的力量来源于文化自身的特性。”^[15]拥有宽容大度的心态远远不够，还要学会欣赏其他文化的特质。如蝙蝠文化，对于西方来讲，接受蝙蝠纹饰的美好寓意未尝不是坏事，而中国受众接受正义的“蝙蝠侠”形象也可让人理解社会正义感的丰富内涵。这样都可为自身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认知角度，以丰富眼界、放大格局。

文化教学教的不单单只是某个文化元素，更为重要的文化元素背后的文化内涵。面对不同文化中的相同意象，出现差异化解读是正常现象。作为一名国际中文教师，不应因文化差异而感到不解，而应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分析文化差异，并通过差异认知的小切口，激发学生好奇心，全面展示文化元素内涵，更好地进行文化教学、传播中华文化。

只有这样，才能客观全面的认识并解读文化元素，才能更好地将这种“展示-对比-交融”文化教学模式运用到实际教学活动中去！

3 结语

总之，蝙蝠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不免会产生理解偏差。通过跨文化交际新视角——即尊重差异、双向交流、构筑人类文明整体观意识，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元素，并探索一条适合文化教学、文化传播的新道路，才是跨文化交际在国际中文教育上实际应用价值真正体现！

参考文献

- [1] 仇任前. 苯教《蝙蝠经》研究[J]. 民族宗教与西部边疆研究, 2018(2): 188, 193.
- [2] 胡司德. 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[M]. 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15: 24.
- [3] 王发志. 广州陈家祠——陈氏宗族的精神家园[M].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5: 42.
- [4] 葛洪. 抱朴子[M].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0: 96.
- [5] 赵梦瑶, 周小儒. 恭王府的福文化[J]. 城市文化研究, 2017(12): 116, 117.
- [6] 陈佳君. 论北京恭王府之蝙蝠意象[J]. 毕节学院学报, 2009(12): 90, 94, 96.
- [7] 朱铁城, 李延林. 英汉语中“蝙蝠”及其相关习语的文化内涵与翻译[J]. 文史博览, 2015(2): 17, 20.
- [8] 克里斯娜·霍莉. 西方民俗传说辞典[M]. 安徽: 黄山书社, 1990: 231.
- [9] 缪塞尔·亨廷顿.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[M]. 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02: 95.
- [10] 郝健. 超级英雄电影系列的文化认同研究——以超人、蝙蝠侠、蜘蛛侠为例[J]. 电影理论, 2016(18): 86, 87, 88.
- [11] 褚骏超. 《蝙蝠侠: 黑暗骑士三部曲》系列电影研究[D]. 江西: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, 2017: 15.
- [12] 周全, 吴毅, 蔡月玲. 南粤传统建筑蝙蝠图案的文化探讨[J]. 四川文物, 2012(2): 83, 89.
- [13] 陈益宗. 东方图像榜·蝴蝶蝙蝠[M]. 长沙: 湖南美术出版社, 2001: 45.
- [14] 苏卡列斯·格雷戈里. 新冠病毒与蝙蝠: 厄运的幸运象征[J]. 科学, 2021(6): 12.
- [15] 伊娃·黛勒, 詹姆斯·林赛. 美国外交思想史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07: 103.

作者简介: 王梦瑶, 2000年, 女, 汉族, 籍贯: 山东省东营市, 硕士在读, 贵州民族大学, 研究方向: 国际中文教育